

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中国哲学自信

——纪念冯契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晓虹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上海,200062)

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市社联、上海社科院联合举办的“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中国哲学自信——纪念冯契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1月2日至3日在沪举行。来自海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及社会各界的代表近两百人与会。会议安排有“纪念发言”、“主旨报告”和“分会场专题报告”等板块。会议收到学术论文百余篇。会议围绕冯契哲学的形成发展及历史地位、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冯契的“智慧说”体系、冯契哲学的特质、中国哲学的理论诠释、西方哲学的理论诠释、中西哲学对话以及“知识与行动”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对话交流。现就会议研讨中比较集中的论题与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关于冯契的学术人生及贡献

高瑞泉认为,冯契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的人,冯契青年时代的经历“是现在学院中人所缺少的”:他投身“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七七事变”以后,随清华南迁到南岳,复北上投笔从戎,到延安,进鲁艺,先后到过山西前线、晋察冀、冀中等敌后根据地,并写成诗集《北征》。“遥想一位当年的文学青年,在烽火连天之际带着剑气箫心回到书斋,何以最后成就了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弄清这一问题,可以从冯契的两段回忆性文字中得到启示:其一是《〈智慧说三篇〉导论》提到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解除了困惑,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其二是《忆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的探讨》中提到当初与金岳霖先生师生论道时所说的,“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不能离开‘整个人’。我主张用 Epistemology 来代替 Theory of knowledge,以为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它也应该研究关于智慧的学说,讨论‘元学如何可能’和‘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这两段文字不仅提示了冯契思想的两个最重要的源头,或许也已暗含了冯契人生与学术追求的动力之所在。

赵修义以“志存高远的专业哲学家、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冯契的为人和为学,指出:冯契是一位“从山坳里走向世界的学问家”,他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大概是20世纪下半期中国哲学家中少有的在国际上引起反响,有能力参与国际范围的百家争鸣的哲学体系”,其所以能如此,不仅是由于冯契受过当时最好的哲学教育和良好的学术训练,更由于冯契丰富的人生实践和对时代的大问题(特别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关切,是与他“叙往事,思来者,通其道”的学术旨趣和理想主义的追求分不开的;冯契以自己真诚的人格为自己提出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名言作出了诠释;冯契认为,“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他期待在世纪之交中国能“进入自我批判与反思阶段”,以便在新的历史时代从精神上、文化上进一步探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而这正是我们后来者的责任。

童世骏在“作为哲学问题的‘中国向何处去?’——理解冯契哲学思想的一个视角”为题的主旨发言中,提出冯契的学术工作可以概括为:“研究真善美,融贯中西马,接续往今来。”其中,“接续往今来”有三层意思:一是他通过对以往哲学历史的研究、与同辈哲学同行的讨论为未来哲学发展留下“经得起读的”著作,二是他继承发扬其老师的学术传统、认真参与其所在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悉心指导年轻学

子的成长,三是他立足李大钊所说的“今”,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进行“述往事”而“思来者”。童世骏认为,冯契主张在“述往事”和“思来者”的基础上“通其道”,也就是要把握和回答时代的根本问题。正像冯契先生自己所言,“真正的哲学都在回答时代的问题,要求表现时代精神。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在追求“以道观之”的“智慧说”当中,它也就成为了一个哲学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而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观的角度,来回答如何看待社会历史和把握历史规律的问题,也需要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回答如何解决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更需要把历史观和认识论结合起来,解决逻辑和方法论的问题、自由学说和价值论的问题。

郭齐勇把冯契的学术贡献与哲学创新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提出“广义认识论”,凸显“自由人格”,化理论为德性与方法;二是提出“智慧学说”,强调转识成智,肯定理性直觉,达致超名言之境;三是肯定生活实践中人的全面发展与平民化的理想人格,以及真善美合一的境界追求;四是对从先秦到近代的中国哲学史作了全面梳理与深度分析,对中国哲学的特质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冯契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与成因、主要范畴、论争及理论成果作了精辟分析,对以‘古今中西’之争为背景的近代哲学的主要论争及理论成果作了深入探讨,言人之所未言,发人深省,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影响深远。”

许全兴认为,冯契最突出的贡献是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三者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创性的“智慧说”。“智慧说”是专门哲学家建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逻辑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突破和新形态。“智慧说”尤其重视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钱耕森在其《大哲冯契其人其学》及会议发言中指出:“冯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一代宗师。他为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所创造的‘智慧说’的新的哲学体系,是中、西、马三种哲学会通的一个典范,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 关于冯契的“智慧说”体系

杨国荣以“世界哲学视域中的智慧说”为题,在分析冯契创立“智慧说”的背景(主要是“古今中西”之争)和进路(基本立场是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围绕“回归智慧:扬弃智慧的遗忘和智慧的抽象化”、“广义认识论:认识论、本体论与价值论的贯通”、“转识成智如何可能”、“人格学说与价值原则”、“语言、意识与存在”等问题,将冯契哲学思想放在近代以来世界哲学衍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呈现了冯契哲学在回应“古今中西”之争、回答时代的中心问题时所达到的哲学之思的宽度和深度。例如,围绕着智慧的“得”与“达”,冯契对言意、心性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辨析,其看法“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言、意、道之辨,又参与了当代哲学关于语言、意识、存在关系的讨论”,“既具体地参与了‘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也从更内在的层面展现了回归智慧的哲学主题”。

张汝伦以“论冯契的广义认识论”为题,在对张东荪、金岳霖、冯契三人各自建构的认识论体系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冯契广义认识论的特点、内容及价值,指出:所谓的广义认识论就是打通知识论和元学,熔二者于一炉;就是将元学(形而上学)纳入认识论,将元学作为认识论的高级阶段。金岳霖在此问题上采取“划界”的办法实际上割裂了知识与智慧,冯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阐明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认识的辩证法”,因此他的广义认识论又称为“智慧说”,这一关于智慧的广义认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力图会通中西哲学的典型案例,它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因素融为一体,代表了中国大陆学者在20世纪下半叶以后认识论研究上的最高成就。

成中英基于对冯契“智慧说”三篇的理解与分析,提出了“发展冯契智慧说”的任务,主张“从理论、方法与主体德性等概念根源上分析与厘清三者关系,进而重建智慧概念,以之为从三者深度统一结构发生或创生的心灵状态与行为模式,同时也是一种开放、独立与自由的人格存在”。在他看来,从当代知识论的观点,可以对冯契哲学的基本概念与命题,对理论、方法与德性的关系给出更为逻辑而客观的说

明,从而把冯契的“智慧说”扩展成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智慧学——“本体智慧学”。

吴根友、黄燕强讨论了冯契的真理观特别是其关于“真理符合论”的思想,认为:古今学者对“符合论”的责难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其一是何谓符合? 其二是符合如何可能? 其三是语言能否正确地陈述真命题? 冯契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既立足实践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又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和“言意之辩”的合理思想,同时还吸收了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新成果,给出了“更为精细的论述”,“发展了黑格尔、马克思的真理观”;尽管现代西方哲学中流行的关于真理本质的融贯论、自由论、实用论、解释学理论等对真理符合论多有批评,但他们的思想大多数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维度,“因而不构成对冯契真理符合论的挑战”。

顾红亮结合冯契哲学体系的建构考察了其“化理论为德性”命题提出的过程,指出冯契在上世纪 50 年代主要从提高思想觉悟的角度提出这一命题,到 80 年代以后冯契创立“智慧说”时,其内涵不仅深化和丰富,而且具有了建构方法的意义。这一命题不仅要从“天人之辩”方面,而且也要从“知行之辩”方面加以理解。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该命题可以看作是对唯物史观的补充,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延伸,与西方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同时代性。

贺善侃认为,“化理论为德性”是一个寓意深刻的哲学命题,这里的“理论”不是泛指所有的理论,而是指能包容天道和人道在在的、亦即能作为智慧之说的哲学理论。“化理论为德性”主要体现了理论中善的价值的实现。理想、信念(信仰)是“德性”的两个重要环节,理想人格的培养,须经理想、信念而化为德性,同时要处理好德性与德行的关系;德性与德行的关系即理论与实践、言与行的关系,而完善的人格必须是德性与德行的高度统一。

三 关于冯契哲学的特质

陈卫平在其论文《以心灵自由为源泉——冯契哲学创作论》及会议发言中指出:冯契的“智慧说”不仅是一种哲学体系,而且表现了冯契的个性。冯契的哲学创作历程,如其自己所言,“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他以心灵自由作为学术创作的源泉,其深刻的启示在于:在哲学道路的选择与坚守上,要坚持三个统一,即心灵自由思考与回答时代的课题的统一、心灵自由思考与独立人格的统一、心灵自由思考与创造性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在对待哲学传统问题上,要坚持三个结合,即“通过”与“超越”相结合、“接着讲”与“比着讲”相结合、“节今”与“言古”相结合。只有把心灵自由作为哲学创作源泉的根柢,才能“自开生面,说自己的话”,使哲学创作具有个性色彩。

宋志明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进行了解析,指出冯契对于如何运用辩证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提出了四个要求:一是把握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二是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三是运用科学的比较法,四是站在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基于这些方法原则,冯契的研究注重把握古代哲学的特色,注重理论思维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概括,给人很强的整体感。同时,冯契注重对古代哲学家作理论分析而不仅仅是把其作为表述的对象,其分析能讲出哲学道理来,因此读冯契的书不仅仅是获取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了理论思维的能力。

崔宜明探讨了“冯契哲学的哲学性”问题。他认为,置身于“智慧之思”的传统,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性思考,把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的生命意义作为宗旨的思维活动所凭依的主观意识,就是所谓“哲学性”;古希腊人的“爱智慧”之“爱”和中国人“求穷通”之“求”,就是哲学性。对于中国哲学而言,哲学性意味着通过以“世界历史”为背景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现实困境(道路选择)的洞察,对内在的文化焦虑的深刻领悟和承担从事哲学创作,进入“智慧之思”的传统;由此中国哲人的历史使命有二:一是建构“哲学史”,二是建构原创性的“中国哲学”。冯契所做的努力正是这方面的体现,冯契哲学是这种“爱”和“求”的典范,其哲学遗产不仅属于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更属于 21 世纪的“世界哲学”。

施炎平围绕“冯契哲学的批判精神”论题,指出冯契哲学的特质可以从鲜明的时代内涵、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等方面概括,但“最值得重视的还是他那种建据于历史意识、理性批判又面向未来的哲学批

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得益于冯契在理解理性概念、把握理性精神上所达到的系统性和深入度,同时也是冯契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家的一种人格精神。

四 关于冯契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方克立以“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贡献”为题,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毛泽东、张岱年等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概括了冯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之特点:一是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独特的哲学观,以“转识成智”和认识天道、培养德性为哲学研究的目的,把人能否获得自由、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纳入认识论的范畴,这是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贡献;二是以“金岳霖问题”作为智慧学说的出发点,力图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指导从知识通向智慧的道路,把认识过程看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交互作用的过程,并对其中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特别是提出和分析了理性直觉、思辨综合、德性自证诸环节在“转识成智”中所起的作用;三是坚持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马克思主义,以宽容精神吸取各种哲学派别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合理因素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是具有革命批判精神、同时也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冯契哲学是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历史背景下,走“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道路的一个成功典范,因此,“冯契哲学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理论水平,在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表现出了中国哲学的高度自信。”

王向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的探讨,分析了冯契哲学的贡献与地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包括实践路径(主要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指导理论)、学术路径(主要指学者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结合起来形成综合创新的哲学理论)、实践和学术相结合的路径(既注意把握哲学的现实根据或理论之“源”,又注意哲学理论的相对独立发展,创建新的哲学理论)。在他看来,冯契的“智慧说”正是前述第三种路径的典型代表,冯契扬弃了单纯的“实践路径”和“学术路径”,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哲学研究应关注和回应时代问题,而且在建构其哲学体系过程中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问题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因此冯契留下的是富有新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胡振平讨论了“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次中国化的贡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思推动理论创新”,而冯契的“智慧说”,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经验教训、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进行反思而提出来的。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一是突破了传统的认识论体系,提出了广义认识论,形成了中西马融通的新哲学体系;二是将人的自由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并对中西自由观的不同特点进行了分析;三是形成了通向自由之路的方法和人格培养理论,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四是反思建国以来“左”的错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高度阐发了当今中国“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论基础。

高慧珠、闫虹珏等分别讨论了“两化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指出“两化原则”的提出基于中国近代形成的“古今中西”之争,是中西哲学思想合流、变革的产物,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方法论和价值取向的指南,也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转型与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设想。冯契的“两化原则”推动了“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与“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

五 关于冯契思想对哲学各领域研究的影响

王路以“传承与发展”为题,讨论了金岳霖和冯契的师承关系、各自的特点及对逻辑学的不同认识,指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命题,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冯契思想理论的特征;冯契虽然明确肯定形式逻辑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是陈述思想和交换意见必须遵守的条件,不过他更注意的是辩证方法,认为以得自客观现实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之道,来还治客观现实和认识过程本身,于是理论变为方法。所以在冯契的思想体系中,逻辑只是局部的东西,整体的贯穿

始终的东西不是逻辑，而是辩证法，这一点与金岳霖有重大区别。

张建军以“摹状、规范与半描述理论”为题，分析了冯契继承和发展金岳霖关于“概念”的理论对于当代逻辑学发展的意义，指出：“概念对所与有摹状和规范双重作用”是冯契在前期金岳霖知识论中所把握的最重要的“合理内涵”，冯契把这个理论发展为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以“摹写”和“规范”为轴心的“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的系统理论。这一“金岳霖—冯契论题”，对于解决当代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中的指称理论疑难，具有重要启发价值和解题功能。特别是对于否定两大长期争论的流派（描述论与真正指称理论）的某些共同预设，探索走出理论困境之“第三条道路”的“半描述论”，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支援。

晋荣东以“论冯契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为题，指出冯契在中国逻辑的发掘、梳理与创造性诠释诸方面的贡献，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的足够重视，事实上冯契对中国古代逻辑之有无、逻辑思维的基本矛盾与逻辑多元论、中国古代逻辑的基本特点与主要贡献等问题不仅关注，而且给出了明确的观点和理论分析，特别是他对中国古代辩证逻辑形成发展线索的考察“发前人所未发”，有“筚路蓝缕之功”。

安维复对冯契的广义认识论所蕴含的关于科学认识论的思想进行了探讨，提出：如果把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理解为事实（知识）与价值（智慧）之间的关系，那么冯契的科学认识论的思想之意义就不言自明。就建构具有民族特点的科学哲学思想而言，“转识成智”可能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纲领”。因为，“科学讲知识，哲学爱智慧，科学哲学就是转识成智”。

朱新轩以“冯契与自然辩证法”为题，结合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历史，指出冯契是“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自然观、科学观及方法论等方面都提出了深刻而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周瀚光讨论了“冯契晚年对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关注与贡献”，指出冯契不仅关注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重视相关研究的专业人才培养（例如在1984年就新增招收了“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方向的研究生），而且积极组织包括“首届中国科学思想史研讨会”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学术活动。同时，在其哲学史著作及《论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等专文中，对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的特点及其对哲学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

夏金华以“论冯契先生的中国佛学研究”为题，通过佛教的中国化、宗派教义、近代佛学等方面的考察，认为冯契不仅对佛学特别是中国佛学下过工夫，而且佛学对冯契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体系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及冯契的“转识成智”理论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

付长珍对冯契的德性理论特别是其“德性自证”观点进行了分析评述，指出德性自证是冯契德性思想中一个富有创造性和个性化的理论表达，包含了深刻的理论洞见，开创了德性伦理研究的新范式，并为破解现代性道德难题、重建市场化时代的伦理秩序提供了新思路。

此外，王博以“王国维境界论与冯契意境论之比较”为题，对冯契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蔡志栋、朱承分别以“化理论为政道”、“自由人格与自由社会”为题，从政治哲学角度对冯契的“智慧说”作了了解或发挥；刘明诗和龚耘围绕“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科学与人文的和谐”、“整体与自我的和谐”等方面，探讨了冯契“智慧说”的和谐意蕴；刘晓虹以冯契1949年发表在《展望》上的《论虚无主义》为主要文本依据，结合冯契晚年在“哲学史两种”、“智慧说三篇”中的相关论述，就冯契对虚无主义的批判思想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评论。

六 关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相关问题的理论诠释及中西哲学对话

在本次会议收到的论文及多个分会场专题讨论发言中，多位学者围绕“世界性百家争鸣与中国哲学自信”的主题，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就自己近期的专门研究成果进行了交流。

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王中江以“秩序、制度与贤能：黄老学派为什么反智的一个内在追寻”为题，分析了在社会秩序安排及对待贤能问题上儒道两家的区别及道家和黄老学派“反智”的本意

与范围;山东大学**沈顺福**通过历史梳理和文本考释,探讨了“儒家体用论的诞生”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围绕“耳目之争”与“耳舌之辩”,对“汉语思想方式之生成脉络”进行了探讨;西藏民族大学**毕明良**从儒墨义利之辩的角度,对墨子的“义”概念进行了探析;华东师范大学**陈乔见**以“羞恶、义与正当”为题,通过对“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之分析,对孟子的“义”之意蕴进行了阐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陈志伟**探讨了孟子关于道德行动与人格生成的思想;安徽师范大学**戴兆国**探讨了中国哲学中关于身命、慧命、德民、福命及寿命五种“命论”及其关系;安徽大学**丁成际**以“日常生活及儒家日常生活伦理”为题,探讨了儒家生活伦理的构成、历史境遇及可能的走向;台湾华梵大学**陈振崑**以“再论牟宗三与唐君毅对于朱子心统性情说的对比诠释”为题,对牟宗三、唐君毅的分歧及朱子相关论述的本意进行了辨析。

在西方哲学研究及中西比较方面,上海社科院**陈常棨**以亚里士多德和维特根斯坦为样本,探讨了“实践智慧与寂静主义”问题,指出实践智慧的寂静主义具有非还原论和反理智主义的倾向,研究这一问题还应注意“实践”与“智慧”之间的张力问题。东南大学**樊浩**结合人类文明的“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通过中西民族的“精神之旅”,分析了“我们的世界缺什么”这一问题,其结论是:“缺伦理”!上海师范大学**张允熠**以“两极相通与中西之间”为主题讨论了中国哲学西传与欧洲的回应;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讨论了“齐泽克与中国古典思想之重释”;上海师范大学**吾淳**探讨了“轴心时期道德或伦理的不同路径与面貌”;上海社科院**余治平**探讨了“儒家恕道与他者伦理之间的张力”;中国科学院大学**徐竹**通过安斯康姆与王阳明的比较探讨了“行动的自我知识”问题。南京大学**李承贵**以王阳明“知行合一”命题在唯物认知范式中的衍化为案例,讨论了中国哲学“马哲化”的过程及其蕴含的问题;复旦大学**孙向晨**提出要“重新审视现代文明的核心观念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观念”,在“双重本体”的张力中“形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谢遐龄**则以“重铸哲学基础:精神”为题,提出在当今“理想信念动摇、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的背景下,“恢复自我意识、精神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是哲学的使命。北京师范大学**张曙光**围绕“自我”与“他者”、“天下”与“世界”的辨析,试图对“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给予“当代阐释”;浙江大学**彭国翔**通过对中西哲学在“形而上学”层面的差异的考察,指出“当前中西哲学发展的前提与前景在于世界哲学的共生共成”。

此外,法国里昂高师的 Jean-Michel Roy 教授以“*What is Practical Knowledge?*”为题,澳门大学的 Hans-Georg Moeller 教授以“*Comparative Philosophy: Past and Present*”为题,台湾东吴大学米建国教授以“*Reflection, Learning, and Extended Knowledge—An East-West Approach*”为题,香港中文大学黄勇教授以“*Empathy with Devils: Wang Yangming's Contribution to Contemporary*”为题,清华大学戴益斌教授以“*Truth and Truth Practices: An Investigation of Davidson's theory of Truth*”为题,华东师范大学德安博教授以“*The Ethics of Roles: A communitarian Bolstering of Confucianism*”为题,宗德生教授以“*Relations in Attitudinal Alternatives and Centered Possible Worlds Account of Attitudes De Re*”为题,作了会议发言或书面交流。

本次会议的内容、形式及研讨过程昭示我们:冯契先生所期望的“世界性百家争鸣”和“中国哲学自信”,正离我们越来越近。而正如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何建华**和哲学所副所长**何锡蓉**在会议上指出的,冯契先生一生致力于将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相结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且创造性地站在中、西、马哲学相结合的制高点上,这种真知灼见和学术贡献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冯契先生的学问之所以在现在有如此大的影响,并将在未来继续产生影响,主要是他把握了这个时代学问的态势;面对西方哲学的包围,中国哲学需要重建,因为这关系到中华民族传统如何能够延续,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道路和生存状态问题。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仍要继续努力。

(责任编辑 付长珍)